

学林

“刹那一瞬”：写短歌的石川啄木

■ 沙青青

2016年，日本文学专家、时年九十四岁的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生前最后一部专著出版，这是一本关于明治时代著名短歌诗人石川啄木的传记。

所谓“短歌”是日本和歌的一种形式，与“长歌”相对应。最早的短歌可见于八世纪成书的《万叶集》，此后千余年间，短歌诗人大多没什么惊世骇俗的想法，而是满足于对前人作品典故的引用和改编。于是，短歌更多成为了公家贵族、文人之间的一种“文学游戏”；比试谁能在三十一个音拍的有限范围内，咏出精妙的四季变化或内心的造作情绪。石川啄木之所以被称为日本最伟大的短歌诗人、明治时期的天才人物，正是因为他打破了短歌三十一音一行的陈规，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极度创新，“开一代诗风”。

作为一名致力于日本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基恩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开始积累声望，先后出版过二三十种以日本历史、文学为主题的专著。此外，他还曾翻译过太宰治、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川端康成等知名大家的作品，也是最早将这些日本当代作家介绍到美欧世界的译者。不过，有趣的是，唐纳德·基恩此前却没有为任何一位日本作家单独写过传记，直到2016年时出版的这本石川啄木传记。

明治维新后，以正冈子规为代表的诗人掀起了日本诗歌文学的新一轮革新并将之带入了新时代。不过，基恩却并不认为正冈子规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日本现代诗人”。尽管子规会用现代日语进行创作，却很少如现代诗人那样吐露自己的心声。事实上，基恩把“第一位现代日本诗人”的殊荣留给了石川啄木，并将之作为了这部传记的书名。

1886年，石川啄木出生于日本岩手县现盛冈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原名石川一，“啄木”是他给自己起的“诗名”，因为他喜欢啄木鸟啄树的声音：

我的窗外是一片漆黑的森林。在它的深处，无论是哪个季节，总能听到啄木鸟啄树的声音……这声音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都能抚慰我，而当我听到它时，无论何时都会感到一股压不住的创作欲——一种在我体内喷涌而出的纯粹快乐，一种可以冲淡写作倦怠的快乐。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啄木作为我的名字。

石川啄木尚年幼时，父亲因遭到当地村民敌视，丢掉了寺庙住持的职位，全家陷入贫困之中。尽管如此，他还是从父亲那儿继承了对短歌的热情。在盛冈中学就读期间，啄木的文学天赋与叛逆性格同时开始激烈迸



石川啄木(1886—1912)



《一握沙》初版(1910)



处女诗集《憧憬》(1905)

发。17岁时他的诗歌就已发表在著名文学杂志《明星》上，而他自己也积极参与和享受抗议校长的罢课运动。此后八九年间，啄木一直处于漂泊无定的生活状态中，除了老家岩手外，还去过北海道小樽、钏路以及东京。当过小学代课教师、报社记者，最后从事的职业是东京《朝日新闻》的校对员。

当时，但凡接触过啄木的作家，几乎无一不惊叹他在诗歌领域的才华。与谢野铁干、晶子夫妇把他看作短歌复兴的希望，森鸥外曾表示“自己最喜欢啄木的诗”。夏目漱石甚至出于“惜才”曾接济又穷又病的啄木。时至今日，只要去接触日本近代诗歌，就很难否认啄木短歌的吸引力。然而，短歌领域的天赋和创作却从未给他带来过

真正意义上的财富。为此，啄木甚至会用短歌来自嘲：

为什么会这样的软弱，
屡次申诉着怯懦的心，
出门借钱去。

为了能赚更多版税和稿费，啄木一度非常希望能转型成为小说家，但并不成功。石川啄木生前最成功的短歌集《一握沙》的稿费是20日元，印数是500份。更令人唏嘘的是，《一握沙》出版时，他刚出生三周的长子就夭折了。啄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收到的《一握沙》的稿费都花在了病孩的住院费上。这本书的样书是在他被火化的当晚到达的。”之后，他在《一握沙》中又补上了八首短歌悼念早夭的儿子。最后一首是：

最后的皮肤里的温暖
咽下最后一口气
徘徊到破晓

事实上，在《一握沙》中，几乎每一首短歌都是啄木个人内心情绪的直白转写。例如：

不能忘记那颊上流下来的
眼泪擦不去的，
将一握沙给我看的人。

又如：

玩耍着背了母亲，
觉得太重了，哭了起来，
没有走上三步。

在啄木之前，罕有日本诗人能如此坦率地将自己内心深处的情绪作为短歌的主题。在基恩看来，这正是啄木身上一种现代性的体现：“我们今天阅读啄木的诗作和日记时，可能会忘记他是在一个世纪前去世的。尽管日本在此期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啄木与我们现代人之间并没有任何隔阂。有时我们可能会惊讶于他的坦诚。”

石川啄木的“坦诚”不仅是会在作品中袒露自己的心情，还在于其会在作品中毫不顾忌地揭露自己的虚伪和阴暗之处。在他的日记中，可以读到如何连累带骗地向友人赊账借钱看病，结果却转头去买烟酒乃至寻花问柳；也可以读到他对妻子、家人以及其他他人命运的刻薄与冷酷；更能读到自负与自卑交织的内心冲突。不同于那些容易移情的传记作者，基恩很坦率地指出：啄木一生中面临的很多窘境是他自己缺乏意志力而造成的，并不能简单归咎于时代或者坏运气。例如啄木总是因为自己的坏脾气而丢掉工作，同时还会为了眼前的

享乐而空掷金钱，事后又陷入自我厌恶乃至抑郁的恶性循环。不过，用基恩的话来说：“但最终我们还是接受了他的失败，因为对于一个天才的诗人来说，这些或许是不可避免的。”

1912年4月13日，石川啄木因肺结核去世。当时石川一家人几乎都被感染了肺结核，他的母亲、妻子节子以及他自己都在轮流忍受咳嗽发烧的煎熬，却没有足够的钱看病吃药。3月初，他的母亲去世，啄木本人只多活了一个月。而节子则死于次年2月。

对当代日本人来说，只活到26岁的石川啄木或许是最知名和最受欢迎的短歌诗人。如此短暂的生命以及其生前的潦倒，与之后日渐隆盛的名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本读者对啄木作品的兴趣激增。去世前两三年，啄木开始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1911年1月一封给朋友信中，啄木如此写道：“我曾犹豫过是否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我现在不再犹豫了……当我第一次读到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时，我深受震撼：没有任何一种哲学是如此广阔、如此深刻、如此确定、如此必要的。”同年住院养病期间，啄木除了反复阅读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还开始读高尔基。啄木作品中洋溢的个人主义气质，也与左翼气质有着一种天然的契合感。1945年后，对于刚从军国主义和审查制度中解放出来的日本读者来说，啄木的文学魅力恰好是被那个特殊的时代环境放大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石川啄木的短歌有过誉之嫌。不同于同时代作家的

主流看法，啄木并不认为形式简约的短歌会限制诗人的表达。他认为正是由其简约，才能允许诗人在灵光闪现或思绪涌起之际第一时间就提笔创作，捕捉到“刹那一瞬”的个人体验。因为人们往往会忘记刚发生的事，刚产生的情绪，啄木则坚信：

任何热爱生活的人都不能轻视这种时刻……虽然感觉可能只会持续一秒钟，但这是生命中的一秒钟，在人的一生中不会再来。我相信这些时刻是应该被珍惜的。我不想让它们逃走。表达这些经验最方便的方式就是用短歌。

另一方面，短歌的简约形式也让诗人无法堆砌词藻来过度夸张渲染自己的情绪又或是在事后建构自己的动机。啄木认为短歌这类形式的诗作，本就应该是零散的，每首作品所涉的意境、所蕴含的情绪都是一瞬间的记录，因此不应该是前后一致的。与之相反，同一个诗人的不同作品之间，理应有冲突和矛盾的，因为“一首诗决不能只有‘诗意’。它必须是对一个的情感生活变化的严肃描述。它必须是一本诚实的日记。”

单就上述这两方面的洞见，便可窥啄木对诗歌艺术的理解是超越其所处时代的。在唐纳德·基恩看来，现代的读者也不难发现啄木其实是他们其中的一员，称其“第一个现代的日本诗人”是名副其实的。从长时段来回顾，石川啄木不过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刹那一瞬”，亦如短歌一样是捕捉诗人“刹那一瞬”的念想。而短歌诗人的身份，与啄木本人短暂的生命恰好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关系。



石川啄木像，位于日本函馆，津轻海峡的大森滨
均资料图片

文汇报
学人
第574期



白娘子为什么是“白”的

■ 梁新军

女变成了白蛇呢？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梳理出白蛇传故事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化史，即白娘子是何时成为“白”娘子的。经过许多学者研究，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完整地描绘出白蛇传故事在中国的起源和演化史了。

今天能发现的最早的蛇女故事，都集中在唐宋时期，大都收录在《夷坚志》和《太平广记》中。许多学者认为唐宋《博异志》中的文言小说《李黄》是最早的蛇女故事。与《李黄》类似的蛇女故事，在南宋《夷坚志》中还有《历阳丽人》《孙如县妻》《杨戩二怪》《钱炎书生》《衢州司户妻》《济南王生》《姜五郎二女子》《净居岩蛟》《同州白蛇》；以及北宋《太平广记》中收录的《老蛟》《王真妻》。在这十二个蛇女故事中，蛇女原形为白蛇的有四个，即《李黄》《孙如县妻》《杨戩二怪》《同州白蛇》。如果再往上溯到《太平广记》中，今天能发现的白蛇传故事之前的蛇女故事中，“白蛇女”故事至少有上述五个。

也就是说，算上《西湖三塔记》，在我们已知的十三个蛇女故事中，点名蛇身颜色的“白蛇女”故事有五个。这占了相当不小的比例，很大程度上已经说明了蛇女故事在早期就已开始了本土化变异，尤其是第一个蛇女故事《李黄》也正是“白蛇女”故事。那么蛇女为什么会变成白呢？白色对蛇女妖的身份建构和故事内涵有何新的发明？

不少学者认为白蛇或白娘子之“白”，意味着纯洁忠贞、善良、吉祥神圣等，寄托了普通百姓的心声。的确，自清代中叶以来流传的白蛇传故事，其中

的白娘子形象给人的印象是相当正面的。但纵观蛇女故事的整个演化史，在白蛇传故事的第一个定本——冯梦龙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之前，上述我们所列举的那五个“白蛇女”故事中，没有一个“白蛇女”可以称得上忠贞纯洁，或者性格良善。事实上，在已知十三个蛇女故事中，大部分蛇女都存在一种共性，即“奸淫”——主动寻求与人间男子交合。这虽然或许不乏良善动机，但与传统上的纯洁忠贞、吉祥神圣等风马牛不相及。

鉴于于此，在回答白娘子为什么是“白”娘子这一问题时，谢兴尧以“白蛇奸淫”为由给出了答案。而丁乃通则认为“白蛇在民间传说中被认为法力最大，而且根据中国民间迷信，这种畸形怪物会有超乎寻常的神力”。白蛇(可能在蛇类中)法力最大或神力非凡，故较易幻化为人，从而易与人类男子产生情爱纠葛。但丁乃通没有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白蛇被认为法力最大或有超乎寻常的神力。

笔者认为，白蛇之“白”或白蛇被认为法力最大，很大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佛教文学中的龙蛇叙事。梳理佛教经典《大藏经》所涉及的龙蛇故事，我们会发现其中提到龙蛇颜色的，白龙或白蛇的数量明显较多。佛教徒熟知的佛陀“钵伏毒龙”故事，在西域石窟的佛教壁画中被绘成了“钵伏白蛇”图像。在深受佛教影响的《太平广记》中，提及龙蛇颜色的故事占比最高的就是白龙或白蛇故事。据研究，《太平广记》的龙蛇故事中言明龙身颜色的有36篇，涉及青白赤黑黄五种颜色，但白龙故事有12篇，占比最高，在四卷蛇故事中，白蛇出

现的次数也最多，达10次。另外，在宋代笔记小说的蛇故事中，白蛇出现的次数相比于其他颜色的蛇也最多。

丁乃通提示的民间文学一线，其背后的信仰逻辑，或可追溯到中国早期信仰中的白色动物崇拜和“物老成精”“物老变白”的信仰。

周秦以降的不少古代典籍中，记载了大量白色动物出现的祥瑞征兆。据统计，周秦以来的古籍如《尚书》《楚辞》《史记》《汉书》等，记载的白色祥瑞动物亦涉及三类，飞禽类如白雉、白雀、白鸟、白鹤、白燕、白鹳、白雁，走兽类如白兔、白狐、白狼、白麟、白鹿、白蛇，水生两栖类如白鱼、白龙、白虬、白龟、白鳖。这些动物的出现都被书写者视为祥瑞之兆，反映出了视白色动物为精灵的崇拜观念。既然白色动物多被视为精灵，其相比于非白色的同类自然应更具灵性，体现在后世的志怪小说中，或许就逐渐变成了“法力最大”或“有超乎寻常的神力”。

关于“物老成精”“物老变白”的思想，东汉王充的《论衡》中有言：“夫物之假托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试人。”《抱朴子》中还有大量“物老变白”信仰的描述，如“千岁之鹤……色纯白而脑尽成丹”“虎及鹿兔，皆寿千岁，寿满五百岁者，其毛色白……鼠寿三百岁，满百岁皆色白”“千岁蝙蝠，色白如雪……又千岁燕，其巢户北向，其色多白而尾

掘”。这种“物老变白”的描述，也正符合先秦以降传说中的仙境动物多为白色的想象，如《列子·汤问》记载，“渤海之东……其中有五山焉……其上禽兽皆纯白”。《史记·封禅书》中描述蓬莱仙山，言“其物禽兽尽白”。《汉武帝内传》中言西王母的车驾多用白色动物如白虎、白麟、白鹤等驱乘。

“物老变白”以及仙境动物多为白色的想象，加上“物老成精”的信仰，或许为白蛇怪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为“白蛇女”故事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干宝《搜神记》中记载：“千岁之雉，入海为蜃；百年之雀，入海为蛤；千岁龟鼈，能与人语；千岁之狐，起为美女；千岁之蛇，断而复续；百年之鼠，而能相卜。”这里虽然没有言明蛇能变美女，但“物老成精”思维下的“狐变美女”逻辑在后世的志怪小说里显然被继承。既然狐狸能变成美女，蛇又为何不可呢？于是“蛇女”的出现似乎就在情理之中。虽然目前有较充分的证据显示蛇女故事可能是外来的，但外来型故事要想在本土生根发芽，也需要适合的“土壤”和环境，“物老成精”“物老变白”以及仙境动物多为白色的信仰或许正是其“土壤”和环境。

总之，蛇女故事如果是在唐宋时期(或之前)自域外而来，那么原先并无特异颜色的蛇女，其转变成“白蛇女”，进而演变成著名的白娘子的原因，很可能正是上述复杂信仰语境综合作用的结果。白娘子或白蛇之“白”，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特色，是世界范围内蛇女故事的中国化现象。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

资讯

英语学者的年度图书之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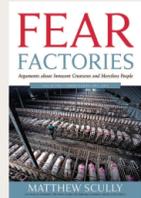
■ 编译/黎文

《高等教育纪事报》近日邀请几位知名学者聊聊2023年读过最精彩的学术类图书。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推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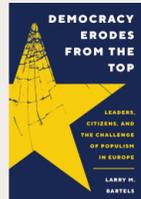
丹尼尔·A·贝尔(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

我今年读过的最激动人心、最重要的历史书之一是约翰·D·加里古斯(John D. Garrigus)的《黑人中的秘密：海地革命前的奴隶抵抗》(哈佛大学出版社，2023)。撰写海地革命前的历史极具挑战性，因为现存的文献资料非常零散，且几乎完全出自法国殖民政权和白人殖民者。得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历史学教授加里古斯在重建被奴役者的反抗形式和网络方面做得非常出色。



玛莎·努斯鲍姆(芝加哥大学法学与伦理学教授)：

我强烈推荐马修·斯卡利(Matthew Scully)的《恐怖工厂：关于无辜生物和无情之人的争论》(阿雷佐图书，2023)。斯卡利早前任职共和党演讲撰稿人，有机会接触到利用非法进口猎物假造的“野生动物狩猎”，写成《支配》一书。现在他将视角转向工业化养殖，观点极其犀利。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并做出相应的判断。



杨·维尔纳·米勒(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与思想史教授)：

过去十多年来，公共事务评论一直被一个隐喻所主导：“浪潮”。我们一直在面对所谓不可阻挡的民粹主义浪潮，即英国脱欧投票策划者之一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所说的“海啸”；媒体也常用浪潮来形容选举结果。然而，范德堡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学教授拉瑞·巴特尔斯(Larry M. Bartels)通过统计调查揭示，今天的欧洲人对政治家和议会的信任度并不比二十年前低，对欧洲一体化的热情、对民主运作的满意度也不比二十年前低，反移民情绪也有所减弱。在《自上崩坏的民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3)中，他指出，根本没有什么“浪潮”，更别提“海啸”了——政治精英，而非普通公民，才是欧洲民主危机的始作俑者。

在欧洲历史上，精英与极右翼的共谋留下极深刻的教训，今天却已被遗忘。巴特尔斯的这部著作对于反击这种政治决定论至关重要。